

萧功秦集

开放丛书●中青年学者文库

ZHONGQINGNIAN

XUEZHENGWENKU

●KAIFANGCONGSHU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萧 功 秦 集

萧 功 秦 著

黑 龙 江 教 育 出 版 社

1995 年 · 哈 尔 滨

(黑)新登字第 5 号

萧 功 秦 集
XIAO GONG QIN JI

萧功秦 著

责任编辑:张佳莉

封面设计:安 家

责任校对:曾一丹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8.625·字数 430 千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 7-5316-2826-0/D·94 定价:17.50 元

自序

当这本 40 余万字的论文集即将交付出版社时，一种希望与读者交流的愿望也就油然而生。我希望在把论文集中各篇文章介绍给读者的同时，也倾述自己多年思想发展变化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个生活在大转型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我力求通过对中国近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的反思，以此来作为研究现实变革问题的学理资源。



大体上，我把自己的治学经历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 1978 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韩儒林先生攻读元代政治史的研究生时期。在这三年中，以治学严谨著称于国内外史学界的韩师，使我有幸受到了相当严格的学术训练。特别感激他的是，当他发现我的学术气质与兴趣与他原来所期望的相距甚远之后，他主动地提出，我可以不必学他的研究路数，（这是一种以历史比较语言学为基础的相当精深的研究路数。）而去走自己的路，读自己想读的书。正是导师的这种爱护与宽容，使我在南大的三年中，能够有相当充裕的时间和自由去从事历史理论与国外新的研究方法的研究与探求，而这正是我后来形成自己研究特点

的起点。

我的硕士论文《论元代的皇位继承问题》与另一篇《论蒙古帝国的汗位继承危机》正是力求从文化角度和以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研究元代政治危机形成机制的尝试。前者研究的是，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传统政治制度，这两种异源的文化因素如何以一种奇特的方式重叠在一起，从而干扰了元代政治程序的合理运作，而我发现，这也是元王朝何以总是周期性地爆发皇位危机的制度原因之一。当时，我还没有能用后来经常使用的“失范”这一术语，来作为解释的中心概念，然而，我对异质制度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脱序的研究兴趣，可以说从那时已经开始形成。

《论蒙古帝国的汗位继承危机》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所完成的论文中我最为满意的一篇。其中大量的史料引证，多少体现了韩师对我的学术方法的影响和熏陶，而蒙古传统继承原则中的四个固有紧张因素之间所形成的危机结构的解释，则是我力求用系统论与结构主义方法从事历史研究的最早尝试。在这样做时，我力求做到不露痕迹。不管该文运用新方法的尝试做得是否成功，但我迄今为止仍然认为，这是采用新方法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

《元代政治改革的一场悲剧：元英宗与南坡之变》一文是我的处女作品，在这篇论文的某些段落行间中，我力求探索一种新的历史叙述风格，一种多少带有作者激情与抒情性的风格。当时，我最喜欢读的是一本由苏联历史学者曼弗里特著的俄文版的《拿破仑传》，正是那种风格深深地吸引着我。后来我写的《儒家文化的困境》，可以说正是这种风格的延续。颇引以为憾的是，80年代后期，也许是由于我更多地追求一种冷峻的理性风格，也许是研究内容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转变，这种文风在后来的文章中已经不多见了。

二

如果说,在南京大学的三年攻读研究生的生活,是我走向一个学者的基础训练阶段的话。那么,自从1982年初我毕业后到上海师范大学任教,直到1987年这五年,则是我的学术研究的第二阶段。作为一个独立的教师,我可以不再受元史这一专业的限制,去关注一些与现实改革问题更为密切的近代思想文化史与近代变革史问题。

当然,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是《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中国士大夫与西方挑战》一书。在本论文集最后那篇介绍我是怎样写《儒家文化的困境》的文章中,已经叙述了我从元史研究转向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研究的原因。可以说,《困境》一书可以被称之为“反思史学”之作,这是一部力求从中国人的主观方面寻求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过程何以失败的原因的著作。其中充满了对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或原教旨式的儒家教条主义导致的中国现代化的挫折的责任进行清算的文化愤怒感。而这种愤怒感,正是我在写作这本著作时的一种激情与动力资源。在这本书中,我力求剖析,在千百年传统封闭体制下,近代中国正统士大夫所形成的文化思维方式的扭曲,以及他们那种以心理自慰与曲解现实的方式来求得心理平衡的特殊机制。

这一特定的历史视角,或许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会独特地加以珍视与把握。因为,我们是刚刚走出封闭圈,迎来开放时代,并曾真切地体验过什么才叫封闭,从而对“封闭”这一文化现象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的一代人,这也是这部13万字的小册子何以发行量高达十万册的原因。我永远不会忘记,写作这部书时所经历的激情,那是一种常常令人在梦中也会“惊坐而起”的激情。我也永远不

会忘记,当年我环绕这一题目在各大大学讲演时,讲台下面那一双双充满历史责任感的眼睛。当我们的社会已经走向不可避免的世俗化的历程时,让我们多少也能保持对那一个时期的美好的回忆与珍惜。

就在写作这篇自序以前不久,海外一位朋友曾来信问我,当我在正面评价近代中国主张渐进的“新保守主义”时,我现在的观点是否与当年写《困境》一书时的观点之间存在着“断裂”?对此,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对造成文化幽闭症的原教旨主义的批判,将始终是我们应珍视的改革思想的资源,与当年唯一不同的是,时代的发展与问题的深入,使我们的研究视野有必要深入到一些更为复杂的领域中去。对传统文化中的负面性的批判,决不意味着非要接受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换言之,批判传统中的消极面,与主张在保持历史文化的连续性的条件下进行变革,是我的思想中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

在本论文集集中,我选载了《困境》一书的第一部分与最后一部分,它们恰好代表了“因”与“果”这两个逻辑环节。

可以说,一直到1988年以前,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基本关注点,始终是官学化的儒家名教,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惰性,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的抗拒问题。在《传统儒学的三种历史形态》一文中,虽然,对先秦儒学,即“原生态”的儒学对涵育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意识方面的作用,作了相当的肯定,但这篇文章的基点仍然是研究儒学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如何与专制政治同构化,从而发展为以荀学为基础的“次生态”以及以理学为基础的“再次生态”的问题,并从这一演变过程来解释中国传统文化何以具有我所谓的“抗近代性”特质的。

这种思路也支配了在我对中国当代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惰性问题的研究。在《传统文化惰性对中国现代化的三重阻碍》一文中,

我指出，中国当代改革中出现的“人欲横流”与“不开化的利己主义”，是传统专制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它制它律”的人格特征在外部约束力放松控制之后的表现，因此，这种种国民劣根性不能通过回复到旧制度中去的方式来克服，而只有通过深化变革，通过横向网状的社会协调机制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铲除。

这一判断，从现在看来，从总体上说无疑也是对的，但也确实过于乐观，过于简单化了。因为，我当时并没有更深入地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既存的社会规范对人的行为的约束能力变得相对较弱，而上述“不开化的利己主义”恶性膨胀的速度远远快于市场机制所培育的网状的社会协调机制的发展速度。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又如何？而事实上，这一点又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常见的情况。我当时之所以没有想到这一点，除了学理资源还不够厚实外，也许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1984、1985年时期的中国改革的现实经验，尚不足以为思考这一问题提供更为丰富的资源。知识分子普遍关注的是，中国是否会回复到旧体制的老路上去。因此，我宁愿更多地强调通过深化改革来克服国民惰性的必要性。

在这里，我之所以特别指出当时我在思想方面的不足，乃是因为，上述过于简单的思路，实际上潜伏着形成一种激进主义思维定势的危险。那就是，这一思路会暗示，改革引发的无序化状态（包括“不开化的利己主义”的泛滥）越是严重，就越需要加大改革力度与改革速度，来作为克服“国民劣根性”的途径。正因为如此，当时我的思想与当时的主流派知识分子并没有多少区别。我们都属于改革初期的“思想解放派”，内心充满着以鼓吹改革开放为己任的使命感，思想纯真而又简单乐观。直到我进入研究的第二阶段，即以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早期现代化为基础的阶段以后，这种思维的简单性才逐渐克服。

三

使我真正走上自己的思想道路的起点,是1987年以后。从那一年起,我开始潜心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如果说,《困境》一书,研究的是,受传统意识影响的中国近代正统士大夫,是怎样扮演了守旧派的角色,那么,更重要的问题则是,自近代以来,那些以变革作为自己选择的方向的人们,为什么并没有使中国现代化取得他们所期望的成功?中国自戊戌变法以来的变革过程为什么总是屡遭挫折?除了保守主义势力的阻力外,中国的改革者在多大程度上也应对此负有责任?中国自辛亥革命建立的早期议会民主政治,是在后发展的亚洲国家中的执牛耳者,为什么会遭致失败?作为对早期议会民主政治的反向运动而出现的袁世凯的军事强人政治,为什么会受到像严复这样的曾经盛赞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家的支持?为什么在后发展国家的议会政治失败以后,均会出现这样一种以“现代化”为其标识的“强人政治”,而袁世凯只不过是其中的始作俑者之一?袁世凯的权威主义又为什么会演变为北洋军阀的分裂时代?这些问题是正在从事新一轮的现代化事业的人们所想知道的,而且也应该是从事当今新的现代化事业的人们进行历史反思的真正基础。然而,这项历史工作,又决不是简单的以政治道德作为判断基础的近代史传统观点所能完成的。

我之所以把这一段历史研究称之为“早期现代化历史研究”,乃是因为它与一般意义上的“近代史研究”不同,它关注的是中国变革者在解决中国现代化面临的困难问题时,所作出的不同的政治选择。这种种由不同的政治选择的交替与更迭而演绎出来的历史,恰恰可以称之为“现代化的政治选择史”,而这种意义上的早期现代化历史,无疑会对当代中国人认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两难

性,对认识新的变革时代的人们在面对类似的矛盾与困难时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与政治价值的同构性,提供了其它任何学科研究所无法企及的丰富资源。

收入本书第三部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内的各篇论文,便是这一方面研究的一些成果。虽然这些文章大多数完成于90年代以后,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观点的形成过程,早在1987年就开始了。

在《戊戌变法与中国早期政治激进主义的文化根源》一文中,我从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派人士在危机压力下产生的焦灼与亢奋心态、“大变、速变、全变”的激进思维方式等方面,来揭示早期中国变革派的心态上的激进主义特征,并进而分析了产生这种导致改革失败的激进主义的思想文化与政治根源。而在《论当代浪漫主义改革观》一文中,我又进一步指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思维与早期变法派人士在思维方法上的关联。

在《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研究》一文中,我重点分析了当清末的最高决策层业已认识到体制变革的必要性之后,由于危机的深化引起的统治权威合法性的急剧流失,如何使这场近代历史上最具规模的、自上而下的变革运动陷入四种无法摆脱的基本矛盾之中。例如,后发型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所要求的国家权力与权威在早期阶段的相对集中运作,与为克服国家所面临的危机而要求的社会动员与政治参与的相对扩大,这两者之间的紧张与矛盾;又例如,改革旧制而导致传统整合方式的丧失,另一方面,新的整合方式又无法单凭体制改变而及时形成,这样就产生严重的改革型的脱序和整合危机,等等。我认为,上述这些矛盾,以及通过对这些矛盾研究而形成的研究范畴,对于理解传统集权官僚体制的变革,对于理解不同时代的集权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上述两篇论文研究的是传统体制下的政策创新过程

面临的矛盾与问题的话,那么,在研究中国早期议会民主思潮的过程中,我进一步发现,在仿效西方现行的政治制度来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以早期议会民主制度作为新的现代化选择的人们,则又陷入了另一种思维陷阱,我把它称之为“制度决定论”。这种思维方法的基本特征是,在忽略西方政治与经济制度得以有效运作所必需的条件的前提下,把简单地引入这种制度,作为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其结果是,一方面,中国既存制度因变革而被人多地取消,另一方面,新引入的西方制度又因缺乏支持性的条件而无法真正建立并有效运作,这样就会产生严重的“改革型”失范。辛亥革命后建立的议会制(我把这种形式上的议会民主制称之为“虚拟民主制”)之所以出现连续的内阁危机、贿选与无休止的党争与内讧这些政治失范现象,均可以用这种“制度决定论”的谬误来加以解释。这种失范又会进一步刺激大幅快速引进西方制度的更为激进的诉求,其结果又会导致新的更为严重的失范,形成恶性循环。这正是自中国近代以来的变革历史不断出现整合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曾在1988年开始研究这一问题,并在《论当代浪漫主义改革观》一文中,初步探讨了这种源自近代“制度决定论”思维谬误的基本特征。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在1988年下半年完成的这篇论文中,预测了中国80年代末以后的改革过程中,从经济领域的“制度决定论”诱发政治领域的“制度决定论”,并由此导致政治冲突不断激化的发生机制,而这一点后来确实是不幸而言中。

在《从政治浪漫主义到政治激进主义》与《自然公理理论与现代激进思想》这两篇文章中,我进一步研究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第三种类型的政治激进主义,那就是被我称之为“政治浪漫主义”的心态。其基本特征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中国变革者,把自己长期受现实逆境压抑而产生的热情、愿望与理想,不自觉地投射到某一

外部对象物上,这种对象物可以是某种西方的“良好”制度,也可能是某种抽象的理念、“终极原理”或口号,当人们这样做时,并不关注这一对象物的真实属性,而是通过这种潜意识的“愿望投射”,和“主体的浪漫地向外扩张”的“移情作用”来宣泄、寄托内心的深层期盼,并从而获得一种“冲决现实束缚而感受到的人生超越感和审美体验。”例如,陈天华与孙中山对中国国民性与民族灵根的礼赞,并以此为根据,来证明中国可以迅速建立西化的民主政治,表现的正是这种政治浪漫主义的情结。

我还认为,正是这种心态层面的浪漫主义与理念层面的“制度决定论”谬误两相结合,导致自近代以来到当代的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政治的错误理解,他们正是以这种理解为基础,要求在无须考虑中国是否具备实现那种民主所需要的经济与社会条件的情况下,来力求实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

可以说,我在早期现代化研究中,着重于分析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现代化目标过程中出现的三种政治激进主义的类型特点,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它们之间存在着层层递阶的关系。

更具体地说,以文化焦虑感为特征的、以大幅变革求得心理平衡的“心态上的激进主义”,在遭到挫折失败以后,“制度决定论”式的激进主义便会应运而起。后者所导致的“失范综合症”,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的社会困局与“文化地狱感”,又会成为以西方抽象的“自然权利”为依据的、“法国大革命式”的唯理主义的激进主义的温床。从戊戌变法、民国初年的议会民主到五四以后的激进反传统与全盘西化论,恰恰代表了“心态型”激进主义、制度决定论式的激进主义与浪漫型的激进主义递阶演绎的三个阶段。

我认为,由于上述思维模式与心态,在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思想传统中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只要存在着一定的结构条件,这三种激进主义之间的循环与交替,便会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重

演。人们可以惊异地发现,当代一些知识分子的变革思维模式,与上述近代思维模式与历程的某些同构性。可以说,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激进主义的批判、反思与研究,是我形成以渐进主义为基础的变革思想的历史资源。

四

如果说,在1989年以前,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主要侧重点,是对近代以来的政治激进主义思潮进行研究的话,那么,从这以后,作为我学术历程的第四阶段,我更注重于运用上述早期现代化研究的学理资源,来对现实变革过程中的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包括从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层面,来思考现代化变迁过程中,何种政治形态最适合于完成现代化的平稳转型问题,实际上,这也是政治形态得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问题。在这一方面,杜尔凯姆与严复这两位思想家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首先要提到的是法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的杜尔凯姆,杜氏在他的《自杀论》中用“失范”(Anomy)这一概念来解释新旧规范对人的行为的制约力削弱之后产生的社会后果问题。这对我理解中国在现代化变革时期出现的“改革型脱序”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从此以后,“失范”便成为我的研究中使用频率最多的一个概念。

此外,杜尔凯姆还指出,人类各社会就其社会成员与分子之间的凝聚方式来划分,可以分为“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两种类型,这一极具涵盖力的思想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不同的社会凝聚结合方式,又要求不同的政治制度、文化与价值模式与之相适应。这样,就从而构成经济结构、社会凝聚方式与制度文化模式的有机整体。例如,自然经济下的农耕社会中的自足个体之间的“机械团结”,需要以宗法家长制、礼法、教化与官僚权威政治来维系整合,而西方

市场经济下的利益分化而又自主的个体之间，正是以契约纽带作为有机团结的基础的，而西方的多党政治、议会民主，个人自由主义的文化价值，又恰恰正是基于西方社会人际结构的契约纽带性质。

杜氏的对两种社会凝聚方式的划分与分析，极为清晰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社会的凝聚方式对其制度结构的决定与制约作用。从政治社会学角度而言，这就是“社会关系结构”对制度文化的规定与制约作用。由此可见，人们决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单纯从道德理念上来选择制度，而应从既存的社会所处的凝聚方式状态，来确定制度的适应性。

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当我从这一新视角来审视中国的改革与现代化问题时，就进一步得出了一个可以作为我的思想基础的重要命题，那就是，把基于西方异质体社会的制度文化，原封不动地移入中国旧体制这样一种“类同质体”构成的社会，决不能解决同质体之间的整合问题。而这种漫不经心的移植，只能导致进一步的失范与危机。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社会变迁中的失范与整合危机，中国现代化就必须借助于某种中介性的制度结构，以它作为社会结构内部变迁的基础，只有在尊重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条件下，循序渐进、步步为营、层层递进，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取得成功。可以说，收入本书第一辑中的《杜尔凯姆、马克思与荀子对同质社会的研究及其启示》一文的最后一部分，揭示的就是这一层意思。

这一观点使我从根本上确立了对“制度决定论”进行批判的学理基础。同时也构成了我所主张的渐进式的现代化操作理论的基础。我把“变革时代的政治社会学”作为本书的第一辑，并把该文置于全书第一篇，正表明它在我的思想求索过程中的重要性。

严复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家中对我思想的形成影响最大

的,我在多次研读《严复集》的过程中进而认识到,正是严复,把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看作是两个不同的“社会有机体”,他发现,当人们把西方社会的某一“良好”的制度或文化因子植入中国社会母体内时,就会陷入“单项植入”与“全项植入”的两难矛盾,我在《“严复悖论”与近代新保守主义变革观》一文中,把这种由严复发现的两难矛盾称之为“严复悖论”,并由此作为出发点,分析了以严复为代表的近代渐进变革观的基本思路。那就是,以从传统中转化过来的政治权威形态作为现代化的启动与整合杠杆,以传统文化价值符号作为中介,诱发社会内部现代化的质素的生长、成熟,并使之与外部引入的新制度相配合,从而形成以内源为主的发展机制,通过这种方式来避免上述两难矛盾,最终实现从传统结构向现代化结构的历史转变。这一表述,也成为我所认为的对中国改革与现代化问题的合理选择的基础。

可以说,自1987年以来开始的对早期现代化中的矛盾与相应的不同的政治选择的研究与分析,奠定了我对中国当代改革与现代化过程中的思潮冲突、两难矛盾进行研究与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基础。

我认为,一个关注民族命运的历史学者,较之其他学科的学者,具有一个特殊的有利条件,那就是,他可以同时拥有两把钥匙:他可以从活生生的现实中产生的“问题意识”,去解索近代历史之谜,开启历史之宫的大锁。另一方面,正是历史学者,可以运用从历史反思中获得的智慧,从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的纽结中,去发现问题的实质。读者可以从本书中发现,我对变革过程中的“失范”、对变革者思维中的“制度决定论”倾向、对政治浪漫主义的特殊心态特征的研究,对权威政治的“两面刃”问题、对现代化过程中的“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现象的研究,这些研究中既渗透着现实改革中的“问题意识”,又同样渗透着历史性的反思资源,所有这些可

以作为我的思想成果的研究,都与所说的“双向思维”方法有关,而这种双向的思维反馈,既是保持历史学的生命力的基础,也是人们认识现代化症结问题的触角的来源。

五

如果说,以上是从我的学术发展过程来进行介绍的话,那么,本书选用的各篇论文则是按照我的思想逻辑构架来组织的。本书按内容划分为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变革时代的政治社会学”,可以说是作者思想的基础理论部分,这一部分中,除了通过对杜尔凯姆、严复等思想家的研究,来阐述政治发展必须以社会经济发展作为基础的道理外,还收入了有关现代化过程中的过渡性权威政治的作用与意义的三篇文章。

我在这些论文中指出,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政治权威对推进改革和现代化,对于保持政治稳定,具有不可取代的经济和政治整合功能;防止政治权威合法性因改革引发的失范和危机而急剧损耗和流失,是现代化成败的关键;改革实效对权威合法性的增值作用,以及政治权威与改革实效之间形成的良性互动,将会增加社会共识,并保证现代化的持续稳定发展。实际上,权威形态研究作为社会学与政治学的结合点,在国际学术界也是政治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我所指的“新型的权威政治”,无疑是中国改革时期知识分子中相当关注的学术问题。在这一部分中收入的《权威与民主: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两难选择》,可以说是我系统阐述自己观点的主要论文之一。

在这里,我需要加以补充说明的有两点,首先,在我看来,后发

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所需要的权威政治,在不同的时期应承担不同的功能,在变革的早期阶段,一方面,它既应反对保守势力对变革的阻抗,又须排除激进主义对变革有序性的干扰,以守护改革所需要的稳定环境。在变革的中期阶段,一方面要防范以政治腐败为主要特征的“软政权化”,另一方面,又必须抑制以既得利益的恶性膨胀为主要特征的“分利集团化”。一种政治权威能否有效地完成不同历史阶段所赋予的使命,是判识其合理性的重要标尺。

同时还应充分强调的是,对一种理想类型的“新型权威政治”的理论表述,决不能意味着对历史上所有的“政治强人”的合法性的辩解,例如,人们不能因为出现过袁世凯,而否认权威政治的历史作用,也不能因为肯定权威政治的现代化意义,反过来去为袁世凯的政治行为进行回护。理论研究与历史现实是两条不同的曲线。两者未必重合。

第二部分“中国当代现代化研究”,则是全书的重点部分,这些论文在第一部分所提供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中国当代改革中的理论与社会矛盾进行分析。其中,《历史拒绝浪漫:中国改革第二思潮的崛起》与《走向成熟:中国改革的反思与展望》是作者在海外发表的最重要的两篇文章,其中既包括对当代知识分子中的激进思维方式与政治浪漫主义心态的批判与研究,对80年代后期的改革矛盾与政治冲突进行的分析,也包括对适合于中国特点的渐进的改革原则的较为系统的阐述。这些发表于90年代初的文章,在海外与国际学术界均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也引起了不少学术上的争议。

在《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中国现代化的两重陷阱》一文中,我特别指出,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有可能陷入“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相结合而形成的“发展综合症”,前者指的是行政贯彻能力退化引起的“规范疲软症”;后者指的是社会分化过程中出